

## 編後記：看見另一種台灣文學年鑑

◎林德俊

由於本年鑑的編輯執行遲至二〇〇一年下旬才正式啓動，喪失了編輯年鑑當下記錄的先機，在時間壓力下，蒐集龐雜細鎖的資料幾乎成爲不可能的任務，最後編集團隊仍以不眠不休的奮戰精神勉力將其完成了，過程中嚴格要求資料的正確性，並對來源可信度難估之資料作必要之捨棄，在正確性的基礎上謀求資訊的完整性。

同受時間資源之限，《二〇〇〇年文學年鑑》的體例架構規劃大體承襲1999年版，追求延續性之餘，也作適度地調整、延展和突破。然而這樣的作法並非沒有爭議，企畫及執行過程中編纂製作小組不斷思索文學年鑑的功能定位及一些技術性問題，其間並有觀點之辯證，我們並從中看見了另一種台灣文學年鑑的可能，茲於以下簡短概述之。

一般論者習於將文學年鑑定位爲基礎資料性質的工具書，主要服務對象爲文學界人士（包括研究者、作家、編輯等等）。然而資料何其多，欲以區區數百頁的篇幅將該年度相關的文學資料「全都錄」誠屬難事，況且文學研究目的千變萬化，不同的研究目的需求不同的資料內容及資料形式，也導致了不同的編輯人才需求。相信不會有一本完全滿足各方需求的文學年鑑存在，而既然再怎麼編都難以面面俱到，年鑑的編輯思考何妨大膽地走向特色的追求，甚至連美術設計都是年鑑風格的表現舞台？

文學年鑑多半帶有文學史的企圖，史涉及了詮釋，不止是綜述，即使看似客觀的資料呈現，都難避觀點的滲入，事實上，「選擇」與「判斷」從一開始的文稿邀約及資料規劃便進場了（例如要邀什麼文章？邀誰寫？蒐集什麼資料？該如何蒐集與呈現？），並且作用在每一個細鎖環節（例如哪一筆資料該錄或該捨？依據什麼價值標準？），認識論及方法論的問題無所不在，諸如「什麼才是文學事件」此類的本質性問題隨時都可能在編輯過程中浮現，這樣的問題卻無法在幾次技術性質的編輯協商中獲得解答，種種辯證也許需要透過一個大型年鑑學研討會才能理出方向。

前兩段大抵指陳了文學年鑑功能定位上的一些難處，除此之外，尚有「誰來編」以及較技術面的「怎麼編」、「怎麼推」的問題。

本次的年鑑編輯團隊與前幾年的固定班底不同，必定牽扯出更大的「誰來編」的問題。固定班底的結果是專業化及權威化，前者爲好事一樁，後者則有值得商榷之處。團隊更迭也許導致了論述權力易手，然而更令人關心的是，我們是否因此獲得了一本「不同」（此處特意用「不同」一詞，而非「更好」）的台灣文學年鑑。其實不論是哪一個團隊來執行，都同樣負載著「官方版」的標籤，「官方版」不意

味著神聖性，卻意味著資源較多（雖然依舊有限），有無可能將這樣的寶貴資源集中火力運用於大型文學資料庫之建制，即時登錄文學資訊，並與國家圖書館等機構的資料庫有機、有效地整合，一來專業分工，二來避免資源浪費。若能有此豐富完整且精確易查找的資料庫作為後盾，民間版文學年鑑的誕生便不再是一種奢望了，年鑑生產可以多元化、專門化，有的強調歷史詮釋，有的強調計量分析，有的特別觀照作家，有的特別觀照讀者，我們也可以期待「台灣新詩年鑑」、「台灣網路文學年鑑」這樣的版本出現，年鑑不必求「大」，但可求「精」。

關於「怎麼編」的問題，對於年鑑的認知差異也許會導致不同的作法。不過至少有一點可以貫通各種作法，亦即在資料的蒐集與呈現上，我們必須及早脫離年鑑編輯的手工業時期。在資料的數位保存技術日漸發達之際，我們也許需要更多熟習電腦軟體操作及資料庫程式撰寫的編輯人才。幾乎所有的文學資料都可考慮用數位方式呈現，如此一來不但龐雜的資料可用一片薄薄的光碟或固定的網址收容，讀者也可輕易利用搜尋程式來查找資料，資料的便捷性和親和性大為提高。對於那些不使用電腦的讀者，年鑑主事單位也可提供列印服務。

最後要談的是「怎麼推」的問題，亦即文學年鑑的接受與消費問題。文學年鑑是否編了就算？要只為文化菁英服務或者也要追求它的社會影響？文學年鑑的出版

是件文壇大事，藉此機會吸引媒體報導及一般民眾對於文學的注目，並非壞事。若能進一步透過各種管道推廣其用途，擴大使用人口，不但能豐富文學年鑑的價值，並可促成各方提出需求，為文學年鑑的編輯方針提供指引或參考。

本文除了是一篇自我檢討，也是一篇後設探究，邀約大家來正視文學年鑑的產出脈絡，期能觸發更多的年鑑思考。本年鑑仍有許多改進的空間，然一切努力必須以文學年鑑的永續經營為前提。如此，我們可以期待台灣文學年鑑的另一種可能。